

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

钱林森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比较文学界所重视探讨的课题,我国前辈学者开拓性的建树大多也集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如范存忠、钱钟书、方重等之于中英文学关系、吴宓之于中美、梁宗岱之于中法、陈詮之于中德、季羨林之于中印、戈宝权之于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等等。比较文学在中国复苏、拓展的三十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是推进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支撑领域,也是本学科取得最多实绩的研究领域。它所获得的这些丰硕成果,被学术史家视为真正“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①,而作为我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显著、厚重的篇幅载入了史册^②。

事实上,在1985—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二十年历程中,作为体现这一复兴、发展特色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研究层面的拓展,还是研究理论、方式的探讨,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单就有影响的丛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大学比较文学所乐黛云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澍著)、《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开其先,到90年代初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乐黛云、钱林森主编,花城出版社),再到新世纪初期大型比较文学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集,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集,乐黛云主编,首都师大出版社)、国别文学文化关系丛书《人文日本》(王晓平

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相继问世,成果迭出,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而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论革新方面,也呈现着向深度和广度突进的势头: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外文学关系探究中的“文学发生学”的建构;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哲学审视和跨文化对话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学精魂的尝试,到西方形象学理论的引进、特别是《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八卷编著和《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出版……所有这一切探索成果的出现,对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深入发展,都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

显然,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基础上,在近三十年来我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情境下,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整体开发已历史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而新世纪文化转型期也为深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为中国比较文学深度发展、分途掘进提供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契机。我认为,我们亟待调动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对已有成果进行咀嚼和消化,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和已有的探索、尝试进行重估和反思,进行过滤、选择、去伪存真,以期对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创造出新的局面。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史学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所以重“事实”和“材料”的梳理。对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整体开发,就是要在占有较充分、完整材料的基础上,对双向“交流”、“关系”、“史”的演变、沿革、发展作总体描述,从而揭示出可资今人借鉴、发展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因此它要求拥有可信的第一手思想素材,要求资料的整一性和真实性,掌握原典型的丰富材料永远是此种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最需要研究者下工夫的所在。前辈学者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使用的方法永远没有过时。早在上世纪我国比较文学举步之时和复兴之初,我国前辈学者季羨林、钱钟书等就卓有识见地强调“清理”中外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它提到创立中国比较文学特色建设和拥有比较文学研究“话语权”的高度^③。20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认为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远没有完成,更何况不少国别和地区的文学关系“清理”工作,尚处于举步阶段。我仍然坚守这样的学术信守:没有调

^①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 王向远教授在其28章的大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中,从第2章到第10章论述国别文学关系研究,如果加上第17、18章“中外文艺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总体研究”两章,整整占11章,可谓“半壁江山”。

^③ 上世纪8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就提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季羨林在《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一文中强调:“我们一定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收集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他明确反对“那些一无基础,二无材料,完全靠着自己的‘天才’、‘灵感’,率而下笔,大言不惭,说句难听的话,就是白欺欺人的所谓平行发展的研究”。参见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第9页。

查,就没有“发言权”^①。

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研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的探讨和尝试,同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和成果。这方面的探究大致是围绕着“影响研究”范式进行的。

首先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命题的提出,及由此而引发出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新路径的热烈探讨。陈思和教授从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实际和他对这一学科深入研究和把握的基点出发,提出“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旨在彰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特征,挑战传统的“冲击——回应”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模式,这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纠偏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不正确操作的弊端,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思考。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亦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所强调的民族文学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是现代“影响研究”所当有的“研究基域和深度要求”^②。就是力倡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也非梵·第根时代排除美学考察的、单一“事实联系”实证考查的守旧模式,从上世纪60年代始,他们就首先把接受美学引入影响研究,二十多年前的今天,法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家谢弗莱尔(Yves Chevrel)在深圳首届年会作主体报告时,第一次向我国学者建议,从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清理中外文学的关系。上世纪末也是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和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将形象学带进了影响研究,将这一研究范式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使陈思和本人二十多年前名重一时的巴金与法国文学论,经过岁月的陶冶,已成为影响研究的精品而留存下来,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非但没有“瓦解、颠覆”影响研究,而且还给了影响研究以丰富和增添。

当“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的因素”论题在上海热烈讨论、争鸣的时候,严绍澂教授则在北京,以他扎实的学风、丰富的国文学养和东洋知识结构,从中日文学关系清理入手,致力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影响研究”模式的开发,他把比较

^① 无独有偶,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出重要建树的严绍澂教授,也在前不久致作者的信函中,强调前辈学者的这个治学路径,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当成是‘比较文学’中的基础性学术,给予超越现在‘重视’的‘更加重视’。一个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层面上展开研究,如果他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最终其实都是些垃圾,更不要想‘传之后世’了。”

^② 查明建《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参见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第9—11页。

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完成了“文学的发生学”理论建构。其重要的文章有《“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关于在比较文学中进行发生学研究的思考》(《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严绍澂提出了与“文学文本”的发生相关联的三种文化语境,即“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和“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并揭示出文本的“变异”机制是文学的发生学的重要内容,而文本的“变异”过程和“变异体”的成立,就其形式与内容考察,都是在“不正确的理解”中实现的。这种确立在具体文学文本解读基础上的学术理论建构,经历了从文学的“关系研究”到“变异体理论”到“发生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的转换,极大地提升、拓宽了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层面和基域,使比较文学在研究趋向与研究结构方面,更接近于触摸到“文学”的本质实际,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真正显示了人们所期待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色和功力。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哲学观照和跨文化文学对话的运用和实践,这是我本人和《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创作者们所尝试的研究路径,当然这也是在“影响研究”范围内的一种思考和尝试。具体的思路有这么几个方面:(1)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互补基点上的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外哲学观、价值观交流互补的问题,是某一种形式的精神交流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中外文化、文学相互影响,说到底,就是研究中外思想、哲学精神相互渗透、影响的问题,必须作哲学层面的审视。(2)考察两者接受和影响关系时,必须从原创性材料出发,不但要考察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追寻,努力捕捉他们提取中国文化(思想)滋养,在其创造中到底呈现怎样的文学景观,还要审察作为这种文学景观“新构体”的外乡作品,又怎样反转过来自中国文学施于新的文化反馈。(3)今日中外文学关系史建构,不是往昔文学史的分支研究,而是多元文化共存、东西哲学互渗时代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重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到对话并且通过对话获得互识、互证、互补的成果,才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学理层面的应有之义。(4)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课题,应以对话为方法论基点,应当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对研究者来说,对话不止是具体操作的方法论,也是研究者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世界观,一种学术信仰,其研究实践既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潜在的读者共时性的对话,通过多层面、多向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激活文化精

魂,进一步提升和丰富影响研究的层次。(5)对话作为方法论基点来考量的意义在于,它对以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种模式的超越。这对所有致力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的一大重要成果,是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建树。周宁教授以他全新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装配,和过人的才气与气魄,奉献出8卷9部编著《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系统梳理、考察了自《马可·波罗游记》7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构想、生成和演变的历史,其重要的理论思路集中在他写的《总序》里,或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他与宋炳辉教授的对话《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里,2006年作者又出版了《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两卷巨作,更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基域、内容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外,从“符号学”互文(intertext)性视角切入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采用“接受学”、“传播学”编织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方法等等,都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是充实、提升“影响研究”的路径。前者不仅可以拓展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层面^①,而且可以处理文学关系中那些“无法追踪来源的代码”、其影响“只可意会无可实指”的文学现象,或同步思考而获相似创造的文学现象(如鲁迅之于西方现代主义)^②;后者则可以尝试以中外文学在对方国度的传播史为“经”,以两者各个层面的接受者(如作家、翻译家、批评家、读者)接受态势为“纬”,从“史”的沿革和发展角度,编制中外文学关系史。

如此,各种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可以尝试、实验,其目的在于深化和丰富“影响研究”的层面,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研究方法或理论范式的探究、实验,与各种研究类型、研究对象的特征密不可分,其有效性与普适性需要得到研究实践的反复验证。切实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原理与方法论的研讨,推广成熟的研究范型,以期结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目标。未来的二十年是中国比较文学深入发展的二十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并存,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沉下心来,携手共耕,我们就能使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2005年8月11日,初稿;2008年7月12日,修订

^① 如秦海鹏教授在处理“谢阁兰与中国”这样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论题时,就采用了互文性视角,拓深了研究层面。参见其 *Segalen et la Chine, 'Écriture intertextuelle et transculturelle*, L'Harmattan, 2003。

^② 参见查明建《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